

Fud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2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State Development

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Fud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2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State Development

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

复旦政治学评论第二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刘建军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1
(复旦政治学评论. 第2辑)
ISBN 7-5326-1429-8

I. 制... II. 刘... III. 国际政治—文集 IV. D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088 号

责任编辑 赵荔红
装帧设计 姜 明

制度建设与国家成长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75 插页 1 字数 360 000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7-5326-1429-8/D·25

定价: 40.00 元

学术委员会

王邦佐 孙关宏 林尚立 吴志华
竺乾威 桑玉成 曹沛霖 商红日

编辑委员会

陈明明 郭定平 周 帆 洪 涛
陈超群 刘建军 胡润忠 彭 勃
陈周旺 任军锋 刘 晔 李春成
顾丽梅 陈 云

本辑执行主编 刘建军

《复旦政治学评论》征稿

1. 《复旦政治学评论》是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组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辑刊。《复旦政治学评论》坚持学术探索之方针,以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为目的。
2. 《复旦政治学评论》由编辑委员会确立主题,由执行主编负责具体工作。
3. 《复旦政治学评论》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4. 来稿请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复旦政治学评论》编辑部收(邮政编码:200433 地址:上海邯郸路 220 号)

编前语

林尚立

中国有很长的历史,那就是中华文明史;中国也有很短的历史,那就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下过著名断语:“资产阶级争取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这一奇迹的形成,其动力不仅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而且来自现代国家的作用:“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而且体会到了现代民族国家对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意义,我们可以从中抽象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道理:现代社会出现,推动现代国家的产生,现代国家在有效推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健全自身。

在人类发展的大历史背景下,现代国家产生的首要标志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其组织特征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这段话中所描述的“集中”与“统一”。“集中”与“统一”的最大意义在于将社会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并使其在统一的公共权力下获得治理与发展。然而,这种“集中”与“统一”与传统社会的“集中”和“统一”有本质的不同,因为,它的持久根基不在权力的集中与垄断,而在制度的网络与权威。因而,现代国家产生的第二个标志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动力,以现代社会为基础和以民主建设为取向的现代制度的出现。现代制度使得实现“集中”与“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共权力得到有效的规范。1844年,马克思曾试图系统地研究现代国家的这两个方面,他列出了研究提纲,其中涉及到现代国家的起源、国家与市民社会、代议制国家与宪章、权力的

分开、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民族、人民、政党和选举权等。也就是在这份提纲中,出现了“政治文明”这个概念。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把这项系统的研究进行下去。但是,马克思把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文明的考察和分析,一直贯穿在他此后的研究中,他对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认识和设想,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逻辑展开的。

走向现代国家是现代人类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根本潮流。虽然这个潮流源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它所形成的新的政治文明形态却属于整个人类的,因为,这种政治文明形态在本质上是以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取向的,对于它所达成的人类政治解放,马克思给予了充分肯定。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来看,正是这种新的政治文明形态,使人类社会在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基础上实现大踏步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制度可能。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但是,它不能因此超越出现代文明发展的范畴。就政治发展来说,它不能抛开现代政治文明成就所提供的基础,它所能做的,同时也是它必须做的,就是如何在更高的形态上确立和发展现代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尚未突破现代民族国家框架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社会在更高的形态上确立和发展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任务,也就是,在更高的价值追求下,通过更为优良的制度体系、程序过程和运行形态来规范和运作公共权力,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整体的优越性。

近代中国上下求索,百年来为创立共和奋斗,根本目的就是力图从古典政治文明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以现代的国家达成现代化发展。辛亥革命创立共和,但没有完成国家的独立与统一,革命后的现代国家建设有形无体。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国的确立。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探索和新实践,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形态。“集中”与“统一”使中国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架构下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然而,由于“冷战”的制约,加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是以建立现代文明为取向,而是以建立后现代文明为取向,这个“后现代文明”就是没有从现实,而是从观念出发所形成的力图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发展形态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并没有真正从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没有现代社会的形态,没有现代社会的发

展,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现代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与此相应,社会主义民主也就形不成有效的建设和发展。

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迈上了正确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使中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真正开始了以现代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两大制度性成果,为这种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动力和广阔基础。一个制度性成果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个制度性成果就是中国与世界在一系列制度平台上所建立的制度化的开放与合作关系。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这两个制度性成果迅速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形态,使其在整体上开始从传统迈入现代。马克思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是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国家真正全面展开的历史是相当短的。然而,从往日的历史积累所提供的资源以及现实的发展所形成的基础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将是迅速而稳健的。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现代国家成长的逻辑,决定了制度建设将是现在以及未来中国国家成长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家成长的重要推进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目标的确立,不仅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正确的取向,而且也为其奠定了一个很高的发展平台。这样,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国家建设,就能够在—个大的时空中展开,既关照到过去、现在与未来,也联结起中国与世界。在目标既定、基础形成的条件下,国家成长的关键就是扎扎实实地进行制度建设和发展,使制度更加系统、更加合理、更加巩固和更有效能。

推动制度建设和国家成长,政治学责无旁贷。制度设计与制度建设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过程和学术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激情,但更需要理性与责任心。在这方面,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在二千多年前所给予的提醒,今天依然值得记取:“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有关政体的建议必须以当代的固有体系为张本而加上一些大家所乐于接受并易于实施的改变。为此,我们必须熟悉政体究竟有多少不同类型,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现实政治给予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在推动中国制度建设过程中,既要有人类意识、世界眼光,同时也要有中国认知、中国意识。

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史虽然不长,然而,中华五千年文明铸成的民族与文化特性将使其能够在成长的过程中以宽广的胸怀和理性的智慧,去吸纳和包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就。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仅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时还要努力用自己的政治创造贡献于人类的政治文明。

目录

编前语

..... 林尚立(1)

政治文明

建设政治文明:中国百年现代化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 林尚立(1)

论东亚政治文明的复兴

..... 郭定平(13)

中国基层社会的形成与政治整合的现代性变迁

——中国社会整合模式的政治沟通

..... 胡位钧(40)

制度中轴和伦理中轴冲突下的政治文化结构

——比较视角下的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取向

..... 韩福国(68)

“道”与“政”: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探析

..... 刘 晔(84)

部分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 罗伯特·基欧汉(122)

政党研究

挑选候选人:当代西方党内民主的核心

..... 朱德米(151)

交易费用与执政党:对政党政治的一种制度分析

..... 李瑞昌(164)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兴衰初探

..... 卢向国(177)

基层政治

“跨单位组织”与中国社会整合

..... 刘建军(199)

国家控制和社区治理:以上海社区调解为例

..... 彭 勃(218)

社区发展中的城市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及其制度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居委会发展研究

..... 郭圣莉(240)

政治理论

传统政治科学的内在矛盾及其转向

..... 何俊志(264)

论政治义务的道德基础

——当代西方政治义务论述评

..... 何历宇(282)

论相对剥夺感与政治稳定

..... 胡润忠(292)

司法体制改革与中国社会整合

..... 程竹汝(301)

前沿与方法

美国国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赵永红(320)

民主政治与社会资本

——论罗伯特·帕特南的民主理论及其对政治学方法论的新突破

..... 许 征(339)

建设政治文明： 中国百年现代化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林尚立

〔内容提要〕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代表人类先进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取向:人民民主、社会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走上这条发展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必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有效实现,不仅取决于政治发展本身,而且取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以及领导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党的建设和发展。

关于人类的现代化发展,著名学者艾森斯塔德的表述最为精炼:“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①在艾森斯塔德所描述的现代化发展现实中,人们不仅能够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能够感受到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转型性。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转型性决定了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不论其起点在哪里,一旦它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它就必然要求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转型和发展,否则,就难以最终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分析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相伴随的事实。^②这

① [以]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相伴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2页。)

个事实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政治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构成现代化发展的有机系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是如此,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模式也是如此。^①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中国上百年的现代化探索与实践中,实现政治文明形态转型,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为这种探索和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景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百年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取向。和中国百年现代化发展一样,中国从古典政治文明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转型的历程也是艰难曲折的,然而,这曲折历程所形成的历史积淀、制度积淀和精神积淀却成为今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因而,有必要从中国百年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来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



不论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还是具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发展,现代化都不同程度地打破了其内在的连贯性,因为,现代化所开启的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化所要建立的现代化社会,是与其先前社会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②如果从社会形态来看,现代社会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社会却是社会与国家相对独立、个人在国家与社会领域都获得相对自主的社会。现代社会实现了人的政治解放,将国家从决定社会的力量

① 美国学者贝迪阿·纳思·瓦尔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归结为两种现代化模式:即资本主义模式与社会主义模式。([美]贝迪阿·纳思·瓦尔马:《现代化问题探索》,周忠德等译,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26-128页。)

②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虽然不是社会发展的至高点,但是它所确立的社会却与先前各类社会有很大的反差,正是这种反差导致了现代史的非连贯性。([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4-38页。)

变为被社会决定的力量。^①现代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代政治文明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生成和发展的。

尽管现代化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非连贯性，但是，这与像中国这样非西方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历史发展的非连贯性相比，要微弱得多。因为，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它所建立现代社会与其先前的社会尽管有很大差别，但在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上，这个现代社会都还是其先前社会历史发展的逻辑的结果。而对于被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纳入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非西方社会来说，所要迈向的现代社会，不仅与其先前的社会有巨大的差别，而且这个新的社会不是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选择和迈向现代化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探索和建设现代政治文明。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其中就包括中华政治文明。虽然用现代人的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我们在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性，但是，如果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置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或传统的社会来考察，就会发现在传统社会所提供的现实基础上，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有了十分成熟的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评价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时，这样写道：“中国传统的官僚封建制度确实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这个制度二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凭这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

①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这种“现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现代社会是以“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财产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为基础形成，“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的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页。）与此相应，市民社会也分解为独立的个人，国家通过人权承认这些个人，这些个人的关系通过权利表现出来。马克思把个人的这种独立和解放视为人类解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这种实现政治解放的个人，是现代社会的成员，是现代国家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2—443页）

来”。^①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成熟性,维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延续性,因而,对于传统社会来说,它达到了它能够达到的成就,培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然而,它在有效维系传统社会的同时,也有效地限制了传统社会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发展的可能,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而,当中国社会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开始现代化发展努力的时候,突破传统的政治文明限制,就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首要任务。

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表明,在如何突破传统政治文明,推进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危机走向复兴的问题上,中国社会形成了改良和革命的两大政治力量。虽然这两大政治力量都主张中国要进行政治变革,引进现代代议政治,从专制走向民主。但是,在政治变革的政治文明取向上,双方存在根本分歧:主张改良者,以改造和拯救传统政治文明为取向,反对推翻君主统治;主张革命者,以结束君主统治、创建现代政治文明为取向,主张建立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现代政治文明,对于前者来说,不是目的,仅是工具;而对于后者来说,则完全相反。所以,主张革命者,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建立现代的西方政治文明,具体的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模式的民主共和国。^②孙中山先生在动员革命时指出:“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③

辛亥革命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文明选择问题,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制度体系因此全面崩溃,中国社会由此迈上了以民主共和为取向的现代政治文明发展之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大旗下,也同样以带有革命意味的激进方式批判和否定了可能抗拒和干扰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传统政治文明中的价值体系。所以,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全面从传统走向现代。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充分表达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文明转型中的这种历史地位:“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

① [英]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7-29页。从前后文来看,在这里,李约瑟更多地是从现代意义上的官僚体制来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制,认为基于科举取士所形成的官僚体制包含的一些合理性因素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现代意义的官僚体制,主要是一种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参见[美]彼得·布劳、马歇尔·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马戎等译,学林出版社,2001年。)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5页。

③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6页。

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①

二

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统治，把中国政治发展引上了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然而，对于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转型来说，革命仅仅为这种转型开辟了道路，现代政治文明要全面确立，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对此，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先生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人之初生，不能一日而举步，而国家之初造，岂能一时而突飞？孩提之举步也，必有保姆教之，今国民之学步，亦当如是。”为此，他主张要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必须从掌握“民权初步”开始。^②

有一点必须看到，尽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从民主共和的角度出发，在本质上批判和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否定中华民族长期发展中所创造的中华文明在政治文明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孙中山先生就指出，若能万众一心，“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有者也，则其成功比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③ 在具体的政治文明建设中，孙中山先生认为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在整体上有根本差别，两者转换需要一个从头学起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就丝毫没有在现代政治文明中能够起作用的一些因素。他举例指出：“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证中国人稟有民权之性质也。”^④ 因此，孙中山先生在国家制度设计中，虽然强调以现代西方制度为榜样，但时刻不忘这个制度设计是为中国所用，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发扬中华文明的长处，为此努力将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融入现代政治架构，创建了以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46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1页。

③ 《孙中山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06页。

④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35页。

“三权分立”体制为模本,但又不同于“三权分立”的“五权宪法”,想以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之长补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之短。所以,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孙中山先生作了这样评价:“在近代中国,能巨眼先瞻,了解中国传统政治,而求能把他逐步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他的三民主义,实能采纳世界政治性潮流之各趋势,而使其会归一致。”^①

然而,孙先生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他无力为其所要建设的现代政治文明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即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从《三民主义》到《建国方略》,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很想把中国全面带入现代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然而,他们有设计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但是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处境的基础和实力。这一方面与这个阶级的不成熟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与其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内在局限性有关。由于形不成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所需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发展,所以,孙中山先生所构想的现代政治文明架构在后来的具体实践中,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实现,反而被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搞得面目全非,民主共和也因此丧失殆尽。

无力解决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最终导致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失败;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失败则进一步加深了国家的危难和社会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勇敢地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并为此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境界,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随着中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也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其根本标志是: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核心,人民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取向。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出了党领导革命建立新中国所要实现的政治景象:“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②

①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年,第1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7页。

三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纪念建党二十八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取向。文章不仅从整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大潮流来把握人民民主，而且从近代中国政治文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把握人民民主。毛泽东认为，中国走上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实践的破产，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但是在毛泽东看来，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展还是为人民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①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探索实践并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开始，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开始。在这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把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任务。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实践的破产中，中国共产党深深地意识到：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必须与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紧密结合。1940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宪政时明确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②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其为民主共和理想而奋斗的过程中，时刻把这个理想与现实的革命需要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个理想实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第1477～14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1页。